

# 中国史学演变与时代的互动



徐良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文  
博  
讲  
坛

1917年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提出著名命题——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总是以现实生活为坐标来衡量和观察历史<sup>①</sup>。没有人能超越时代，有什么样的时代就会有什么样的历史叙述。

历史学的时代性具体表现在我们对历史的阐释和建构与时代背景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历史学的阐释与建构受时代需要、时代思潮与认知体系的左右，反过来，历史的阐释与建构又影响时代的观念、行为与认知体系。

考古学的发展同样与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思潮密切相关，对考古材料的阐述折射出当时的政治取向和社会价值观，并影响到考古学的实践与发展。布鲁斯·崔格勒的名著《考古学思想史》专门探讨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中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和时代思潮与考古学(包括考古发现、研究方法、目标和考古学阐释等方面)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也是该书被世界学术界所推崇的重要原因。他说：“社会流行的看法是将考古学视为一门与当代社会的需求和关怀毫不相干的冷僻学问。……但是，近两百年来对考古发现的广泛应用的关注已经否定了这种看法。”<sup>②</sup>因此，“阅读《思想史》不仅可以了解人类了解自己历史的过程，也可以深刻体会到人类自身观念对这门学科发展的制约和推动。在这门学科酝酿和发展的过程充满了宗教信仰的钳制、文艺复兴的洗礼、启蒙运动的熏陶、进化论思想的引导、种族主义思潮的逆流、民族主义浪潮的推动、以及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碰撞。”<sup>③</sup>

历史学问题、概念、史料、话语权、需要与目的等的时代性与地域性决定了历史学所具有的时代性与地域性特征。

## 一、史学与时代

### (一) 史学问题的时代性

确定自己的研究问题是史学研究的第一步，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弗尔说：“确切地说，提出问题是所有历史研究的开始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历史……提出问题和形成假设，这两个程序构成了所有现代科学工作的基础。”<sup>④</sup>马克思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sup>⑤</sup>时代的问题需要历史学家予以回应并提供历史借鉴。“历史学的生命力在于时代和社会发展对它的需求，以及它如何回应时代和时代的呼唤。”<sup>⑥</sup>作为生活于特定时代与社会环境中的史家选择关注的主题与问题既受到个人的价值判断的影响，也受到社会环境和时代认知的影响，史学问题往往是对时代问题直接的或间接的反映与回应。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人关心不同的问题，它们都会反映在历史学的问题意识中。

专制王朝的帝王将相史，中世纪的神学历史，近代社会的民族国家史，进化论思想下的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人类生产技术演变、家庭形态演变、社会复杂化过程、国家形态演变等等相关人类文化的方方面面研究，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和古史重建与疑古学派和新史学出现，1949年后的马列主义史学，近代工业革命与生产力，即生产工具与技术发展决定论，当代严重的环境问题与新考古学的生态影响论和环境史<sup>⑦</sup>的兴起，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史<sup>⑧</sup>写作潮流，当代中国流行的各种对传统历史叙述的解构与重构等等，无不是时代问题和主题在历史学上的反映。在大一统的皇权专制王朝时代，会有王朝断代史、祖先创业史、帝王将相史等等，但

很难想象会有我们今天热衷的国家起源（而非王朝起源）、民族起源、文明探源等史学话题。同样，在神创论或英雄创世论盛行的时代，神或英雄创造了一切，我们也很难想象有各种事物演化史的叙述。

## （二）史学概念与范式的时代性

历史研究与陈述离不开概念，而概念及概念的内涵往往具有特定的时代性。

概念的演变反映了时代观念和认知的变化，每个时代都有一套自己的概念体系，每个时代的史学家就是用这套概念体系去阐释、建构历史，做出自己的历史陈述，以满足自己和时代的需求。克罗齐说：“一眼就可以看清楚，古代历史编纂学是适合于古人关于国家、宗教、伦理以及整个现实界的概念的；中世纪的历史编纂学适合基督教的神学和伦理学；19世纪前半叶的历史编纂学适合于唯心主义的和浪漫主义的哲学；19世纪后半叶的则适合自然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哲学。”<sup>⑧</sup>胡适所提倡的“历史眼光”也认为：“研究古人思想，在取用史料时，必须注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字、术语’，‘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体，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文体’，以及‘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即有那个时代的思想’。”<sup>⑨</sup>

近年来兴起的概念史研究<sup>⑩</sup>，专门对概念及其内涵的出现、演变及其与时代背景的关系进行研究。金观涛、刘青峰以“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为基础，选择了流行于近现代中国的关键词，如科学、民主、权利、社会、公理、经济、革命等，考察这些词汇所代表或体现的观念如何起源、演变，乃至最后的整合与结果。<sup>⑪</sup>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种古今概念的异同及其内涵的演变。

另外，古今有些概念词同未必意同，我们必须注意到它们彼此之间的内涵差异。例如，古代的“中国”基本是一个地理、文化中心的概念，不是主权国家政权的“中国”概念，古之“中国”非今之“中国”<sup>⑫</sup>。同样，古代文献中的“族”概念与今天的“民族”概念也不能划等号<sup>⑬</sup>。

对于考古学来说，考古学家对古代各种遗存，如灰坑、窖藏、祭坛、宫殿、尊、罐、钵、碗等器物的命名及其性质的推定与前面所说的“概念”相似，都是当代学术界的约定俗成，未必是真实历史的再现。正如我们通过考古学界对“尊”类器物命名研究所展示出来的结论：“由尊类器物命名和性质界定这一典型个案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考古学界关于古代遗物命名、分类与定性研究中所蕴含的强烈时代性与主观性。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考古学本质上是考古学家通过古代遗物对过去历史所作的一种解读与建构，是一种具有时代性的描述与解释体系。真实的历史已成为远离我们的自在过去，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既不能重来与再现，也难以实证。”<sup>⑭</sup>

今天我们以尊、罐、灰坑、窖藏、某某考古学文化等等名称去称呼古代遗存，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旧石器时代、新时期时代、氏族、部落等等概念去描述古代社会时，我们实际上是在以当代的概念去解读考古发现和历史现象，重构古代历史叙述。概念体系的时代性使我们所构建的历史叙述具有时代性。

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著名的“范式”（paradigms）概念<sup>⑮</sup>。历史学、考古学的阐释与建构同样遵循特定的范式，采用特定的史观与理论。范式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从历史学的发展历程看，每一种范式都是它们那个时代人们需要与认知的产物，具有时代性。

## 二、中国史学三阶段：先秦史学—专制王朝史学—当代民族国家史学

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历程，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史学与时代之间的互动关系，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呈现出明显不同的面貌，具有明显的时代性。

### （一）宗法制时代的商周时期史学

商周时期，尤其是西周时期，政治体制表现为宗法制国家，基本特征包括：以祖先崇拜为主导意识形态，权力大小、地位高低来自与伟大祖先血缘关系的远近；家国同构，血缘组织是社会的基本组织，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以血缘组织为基础来展开，血缘关系是纽带；政治体制上，某种意义上是王族天下，王是大宗、天下中心的象征、所有诸侯国的共主，各级贵族权利世袭，世卿世禄，通过宗法制度和联姻制度维系政权的统一，确定彼此的等级、权力与义务。傅斯年说：“殷周之世，在统治者阶级中，家即是国，国即是家。”“战国初年，乃中国社会自‘家国’入‘官国’之时期，顾亭林所谓一大变者也。前此家国非二事也。”<sup>⑯</sup>

理解了商周社会基本结构与政治制度也就理解了当时的文献记载文本——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历史记录与叙述。从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内容和诗经、楚辞等记载来看，甲骨文中的商代周祭体系和商王谱系都是基于对历代先公先王的频繁的循环祭祀。青铜礼器上的铭文记载是：“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着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铭者论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见《礼记·祭统》）《诗经》保存了大量周人祭祀祖先的材料，主要用于祭祀中的吟唱歌颂。例如，《诗经·大雅》中的《生民》是赞美周始祖后稷，并以后稷配天，《公刘》是赞美周先祖公刘迁豳，《豳》是赞美太王（古公亶父）迁岐，《文王》是赞美文王图商，《皇矣》

是赞美文王伐密、伐崇,《思齐》是赞美文王母大任(王季妃),兼及祖母太姜(太王妃)、妻大妣,《大明》是赞美文王、武王兴周灭商,《文王有声》是赞美文王作丰、武王作镐。这些诗全是在宗庙之上祭祀各位祖先所唱之歌。其他与祖先祭祀有关的诗还有《生民》《既醉》《鳧鷖》《假(嘉)乐》《棫朴》《旱麓》《洞酌》等。除了以上周王室的祭祖歌外,各诸侯国也有自己的祭祖歌,如《鲁颂·閟宫》中追述了姜原、后稷、大王、文王、武王、成王、周公、鲁公伯禽等鲁国的直系祖先,《商颂》是宋襄公所作,因宋是商末王子微之后,故《商颂》中追述了简狄、契、成汤、武丁等祖先。“从《诗经》看,在许多典礼中,以祀祖的典礼最为重要。”<sup>⑧</sup>

所有这些有关历史的记录与叙述主要是以祖先世系和祖先功业为核心,重在歌颂、祭祀祖先神祇,目的是证明家族的伟大、传承有序,自己的权力来源具有神圣的合法性,同时强化家族成员认同和向心力。它们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呼应,呈现了中国早期历史叙述的基本面貌和历史学的特征。

## (二) 皇权专制时代的王朝史学

秦汉至明清,虽然每个朝代的政治体制各有特色,但总的来说属于皇权专制的王朝国家时期,基本特征包括:以君权神授和家天下为主导意识形态,皇权专制与郡县制、官员任命制相辅相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为一家一姓所有,缺乏当代民族国家所强调的公民意识和自由、平等、共创、共有、共享的理念;强调忠君爱民;家族性质的祖先崇拜与祭祀大大弱化,祭祀天地的郊祭、封禅大典成为国家主要宗教活动,与之相关的是天坛、地坛、圜丘等一系列礼仪建筑遗迹,皇家宗庙不再占据中心位置,象征财富和权力的物品代替象征等级和地位的礼器成为墓葬的主要随葬品;地缘组织超越血缘组织成为主要社会政治组织,社会基本经济活动以家庭为单位,个人和家庭成为各种活动的主体;各级官员由皇帝任命,理论上只对皇帝一人负责;思想上推行独尊儒家以统一全民意识;经济上,实行重要资源的国家垄断,以控制国计民生。

与这一时代背景相对应,历史记述的核心由商周时期的祖先转向现实世界的帝王将相,由宗庙祭祀活动转向朝堂政事活动,历史叙事文本也从祭祀吟唱变为专门记述。中国的传统历史著述,无论是纪传体,还是通鉴体、三通体,都是政治史,是为少数统治者服务的,而不以大众为服务对象。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有很长一段时期,史学工作者,着重在少数上层人物的作为,尤其是统治阶层的行为,于是史家以政治史为主体,思想史方面也往往限于有大影响力的思想家。”<sup>⑨</sup>“‘二十四史’则都是对‘王朝体系’的说明,是贯彻王朝观点的叙事,它所叙述的事实都是被王朝观点所认可的事实。”<sup>⑩</sup>“为了

突出传主的官场生涯,传文往往在以下几个方面大费笔墨:其一,详细罗列传主的官职任命与升迁;其二,铺陈传主在职期间的主要政治建树;其三,时常引用传主的各种上书或给皇帝的奏章。”“至于他们的社会身份、个人性格以及官场以外的其他生活经历,传文中却完全空白。”<sup>⑪</sup>由于强调史学的强烈政治性和致用性,中国传统史书中传主及书写内容基本都与政治关系密切。有人说:中国史书特别爱写宫廷斗争,而对经济和社会的大局描写不够。

这种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史叙述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是受皇权推崇而居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钱穆说:“中国二千年来之人才几于皆儒教之人才,故二千年来之历史亦不啻儒术之历史,二千年来之文化亦不啻儒术之文化也。”<sup>⑫</sup>专制皇权时代的史书编写和史学理论的讨论,如三通(即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和司马迁、司马光、章学诚等对历史学的议论,均是以儒家史观为指导思想。

与这一时代背景和指导思想相应的独特史观包括道德史观、尊古史观、循环史观、“大一统”史观和“正统”史观等。

### 1. 道德史观

中国传统史观认为史学具有记录历史事实和维系人伦价值的双重职能,故道德评判在史书中占有重要地位,历史因果关系的分析中常见以君主的“有德”“失德”来解释王朝的兴衰,如《尚书·召诰》所云:“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即认为夏商皆因失德而亡。

孔子的春秋笔法开创了“以史弘道”“经世致用”的先例,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史学不是为了客观真实地记录史实,探讨事件背后的原因,而是要作为褒贬人物、传播儒家道德观的教化工具和统治者的纪念碑。在中国传统史学著作中充斥着儒家道德观,并影响到史料的选择、编纂,人物、事件的褒贬,行为是非的评判等等。个人德行与王朝兴衰被认为是密切相关的,成功的统治者往往被描述为德行高尚的人,而失败者一般都是道德败坏。其他因素,如经济失调、社会结构扭曲、自然灾害、疾病流行等要么被忽视,要么通过“天人感应”的解释与统治者的德行联系起来。<sup>⑬</sup>即使如司马迁,对于历史上的王朝也总要想办法找出其祖上积德的证据,如殷王朝先祖契佐禹治水有功,姬周之先祖弃发明农业造福民众,秦祖大费“与禹平水土”,等等。

### 2. 尊古史观与历史循环论

与当代的进化论截然相反,尊古史观认为时代越古社会越好,正如《礼记·礼运》所记,尧舜禹的上古三代是大同世界,夏启开始至西周,社会沦为小康社会,到了东周时期,社会更是沦为连小康都不如的时

代了,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由“尊古史观”推演出崇古尊祖的价值观,如“古人高于今人”“前辈不可超越”“祖宗之法不可变”等。胡应麟说:“宋世书千卷,不能当唐世百;唐世书千卷,不能当六朝十;六朝书千卷,不能当三代一,难易之辨也。然今世书万卷,亦不能当宋千。”<sup>④</sup>也是这种观念的典型反映。

与尊古史观相关联的是历史循环论,《孟子·滕文公下》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司马迁说: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一治一乱,一盛一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有学者总结说:中国传统的王朝历史记录所体现的是一种“治乱循环”,其背后的“时间”并非单向的进步,而是“时间”的周而复始的循环往复;决定兴亡的并非生产方式的进步与否,而是天命的流转。<sup>⑤</sup>

### 3. “大一统”史观

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只能有一个政权,一个权力中心——皇帝专制的王朝。在“大一统”的史观中,天下一统的王朝才是盛世,多元政权并存的所谓“分裂时期”则是乱世,即“所谓分权或自治导致分裂,分裂产生战争,战争破坏国家统一,祸害人民;集权、统一意味和平稳定,安定团结带来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思维模式始终是中国人不可动摇的政治理念。”<sup>⑥</sup>圣君雄主和广大民众的最大政治理想就是要实现“天下一统”,即使像宋代这样经济、科技有巨大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和自由度有很大提高的朝代,由于与宋辽金等政权并立,未能完成天下一统,也不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王朝,而是一个积弱的朝代。

作为传统王朝史学的价值标准和叙述基调的“大一统”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不知不觉中形成我们观念中根深蒂固的“大一统”理念。

### 4. “正统”史观

有道德史观、“大一统”理念,有“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皇权专制观念和以皇权为中心的一个中心、一条主线的历史叙述体系,必然会导致“正统”史观的出现,即建构历史叙述、解读历史现象、评价历史人物时,必须要做出谁是正统、谁是僭越,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的二元区分,由此,“正统”史观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中国史学传统的一个突出特征。谁是正统的观点也反映出史家的立场与观点。饶宗颐的《中国史上之正统论》一书对中国史学传统中正统论的起源、各种观点及其意义等作了全面梳理。<sup>⑦</sup>

有学者指出:“正统观念是中国传统史学中最深层的历史观念之一,对中国史学的内容和形式诸方面,均有着深刻的影响。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观念,正统史观直接左右着史家作史的动机、史料取舍的标准、

史事褒贬的态度和洞察历史的见识,制约着史学的社会功能,从而也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史学发展的趋向和态势。”<sup>⑧</sup>

正是由于特定时代背景及其相应史观的影响,中国皇权专制王朝时代的史学形成了自己的特征与问题,梁启超总结说中国传统史学有四弊,即“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中国之史,……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而焉。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凡著书贵宗旨,作史者将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碑耶?为若干之过去事作歌舞剧耶?殆非也。……凡病根所从起,实由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史之精神为何?曰理想是已。……今中国之史,则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由此四弊复生二病,即“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人脑之价值者。”“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sup>⑨</sup>

### (三) 近现代民族国家时代的科学史学

自清末民初以后,中国进入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阶段,受到世界大势的影响,中国从传统的“天下中心”体系进入当代的世界国际体系中,中国不再自认为是天下的地理、文化中心,而自定位为国际体系中诸多彼此主权平等的民族国家之一。当代民族国家与过去皇权专制王朝有根本性区别,强调天赋人权和人人人生而平等,以民主和科学为主导意识形态,国家为人民所共有、共享,管理者权力来自人民的授予和委托,个人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活动的主体,以法治为基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经济上以全球市场、分工合作、集约化生产等为基本方式,等等。

科学成为时代主导性的认知体系,科学、民主、进化论、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文化、社会、制度等等成为历史学主导性主题与概念。为了实现史学实证科学化,满足建构民族国家历史记忆和建设与世界史学一体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需要,以梁启超等一大批史学家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史学界发起了“新史学”运动,目的是改造旧史学,建设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新史学体系。

“新史学”的核心是历史学的实证主义科学化和民族国家历史叙述体系的构建。通过疑古和各种新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历史叙述体系的重构,新史学迅速兴起,新的历史解读与建构取代旧的历史解读与建构成为主

流,并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

与传统皇权专制时代的王朝史学相比,当代历史学无论在关注点、视角、方法、史料记录与收集、陈述方式、概念体系、理论体系、服务对象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百年以来,特别是民国以来,不但中国史的研究重点已与以往的史学传统大异其趣,而且史学上的基本概念和语言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sup>⑧</sup>戴逸把20世纪中国史学的成就和特点概括为:第一,进化史观风行。第二,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并在历史学界确立了主导地位。第三,理性精神的发扬。第四,开放历史观的确立。第五,研究内容的拓展和丰富。第六,爱国主义传统的发扬。<sup>⑨</sup>赵世瑜认为,20世纪中国史学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即从传统的政治史范式向经济史、社会史范式转变,从自上而下看历史发展到自下而上看历史,再发展到整合的历史观。<sup>⑩</sup>侯云灏认为总结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可以得出三点基本认识:第一,社会思潮对史学思潮有直接的影响。第二,20世纪中国史学表现为两大趋势:一是科学主义趋势,一是人文主义的趋势。第三,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各种思潮蜂拥而入,但没有体现出西方史学思潮原有的时间性和层次性,经过时间的筛汰,出现了重新组合。<sup>⑪</sup>

中国近现代历史学的时代特征大致可以概括为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史构建和实证主义的史学科学化追求。

### 1. 民族国家史的构建

近代民族国家历史的建构是世界普遍现象,是全球一体化过程中各地区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在历史学上的必然反应,每一个民族国家都将建构自己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作为历史学的主要任务。

在中国,由于传统的中华文化优越论心理和被西方列强欺凌的巨大反差,民族主义思潮与意识更为强烈。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民族主义’一直是主流话语之一,现代民族意识是中国现代主体建构中的一种公约数,‘民族主义’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百年的中国历史离不开在‘民族主义’视角下的观照和反思。”<sup>⑫</sup>从章太炎的“史学革命”、梁启超的“新史学”到郭沫若、范文澜、钱穆等人的中国通史撰写,再到李济等人寻找中国民族文化的起源,再到近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等等,无不受到民族主义思潮的强烈影响。它们的目的都是希望通过中国民族国家历史的重构来重新定义民族国家的“中国”和“中华民族”,确立其在世界的地位,重建中华民族的发展史,重构国人的历史记忆,鼓舞民族精神,培养历史认同,增强向心力和凝聚力,进而追求民族独立与复兴,适应由民族国家所构成的当代国际新体系。

梁启超说史界革命的目的是要把史料和对史料的

解说结合在一起,以提供行动指南和唤起爱国主义意识。他认为“不对史学进行革命,史学便没有能力促进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和保证中国的续存。”<sup>⑬</sup>“新史学”派试图通过重建中国历史的叙述系统来建构中国民族国家观念。他呼吁撰写符合新时代,培养新国民的新民族国家史叙述,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他提出:“今欲成一适合现代中国人所需要之中国史,其重要项目,例如:中华民族是否中国之原住民? 移民住民? 中华民族由几许民族混合而成? 其混合醇化之迹何如? 中华民族最初之活动,以中国何部分之地为本据? 何时代发展至某部分,何时代又发展至某部分? 最近是否仍进行发展,抑已停顿? ……举要言之,则中国史之主的如下: 第一,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 其所产结果何如? 第三,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 第四,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全人类所应负之责任。遵斯轨也,庶可语于史也。”<sup>⑭</sup>顾颉刚在《禹贡》发刊词中说:“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之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sup>⑮</sup>

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李济也曾说他的志向是:把中国人的脑袋界定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段出来,要是有机会,他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出人家不要的古迹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sup>⑯</sup>“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著名历史、考古与民族学者之学术名著,如傅斯年之《夷夏东西说》、芮逸夫《中国民族之构成》、以及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由某一角度,多少都反映着‘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国族主义’结合。借着这些著作,也强化了中国国族内涵及其内部区分。”<sup>⑰</sup>即使如顾颉刚,“与梁启超、胡适一类‘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学者对比,顾颉刚无疑是一位纯学者。但他是有政治关怀和牵引的,以民族前途为忧,生民休戚为念,……想写一部说明中国前途‘终究是有望的’通史。”<sup>⑱</sup>

其他如蒙文通的《周秦民族史》、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和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都对上古的族团进行了研究。为什么他们都关注这一问题呢? 李零说:“上述族团说各有偏重,但时代背景相同。时局危机让他们不由自主联想到历史上的夷狄交侵、不绝如缕。民族问题和地理问题不光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sup>⑲</sup>

近年来,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课题提出和得到广泛支持无疑也都有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时代背景因素的影响,也是历史学时代性的必然结果,无需否认。在相关立项和结项报告中对此都有表述。<sup>④</sup>

## 2. 史学科学化浪潮

近现代中国史学界积极倡导建立科学的史学,史学科学化是新史学的基本诉求和奋斗目标之一。许冠三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学学术史,指出近代中国史学“其一,所有新史学流派莫不因应于西潮的冲击而生,或以洋为师,或以洋为鉴,或挟洋自重。虽然,各家所揭新义最终亦莫不力求融会中西,贯通新旧。其二,从新会梁氏倡‘历史科学’或‘科学的历史’起,‘历史研究科学化’始终是新义例的中心关注。……历来的巨子,无论是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王国维或陈垣,甚至李大钊,‘莫不以提高史学的科学质素为职志,尽管‘科学化’的内容和准则恒因别派而异,且与时俱变’。由七十年代起直至如今,‘史学科学化’或‘史学现代化’,几乎已成了台湾海峡两岸新锐学人的‘共识’,而‘走科际整合的路’,特别是采借社会或行为科学概念与手段的呼声,在本土史学界所起的共鸣,更是与时俱增。”<sup>⑤</sup>

追求史学科学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以进化论来解释历史的变化,以进化的阶段论来建构历史的发展过程。历史学的目标往往被确定为如同自然科学的物理学、化学那样,要寻求历史发展背后的某些规律或决定性力量,进而指导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进化论对中国历史学的影响是根本性的,进化论改变了皇权专制时代的“尊古”史观和循环史观,指导了中国历史阐释与叙述的彻底重构,重塑了中国历史的陈述与评价体系,人类社会越来越好的观念深入人心。

新史学改变了传统的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叙述体系和道德史观,对各种历史文化现象的专门研究,人类社会发生的变化及其原因的探讨、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类历史事件、各类人物作多视角的研究和评判等等成为史学的内容。另外,在近现代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新范式,包括一大批新主题、新概念、新方法、新理论,以及新学科,如考古学等。

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史构建和科学主义实证史学诉求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潮流角度来分析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夏鼐关于考古学及考古学文化的定义,我们不仅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他对考古学及考古学文化的认识,而且更能清楚地看出他的认识同样是时代的产物。

夏鼐将考古学定义为:“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

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作为一门历史科学,考古学的研究不应限于对古代遗迹、遗物的描述和分类;也不应限于鉴定遗迹、遗物的年代和判断它们的用途与制造方法。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便是指导研究这种规律的理论基础。”<sup>⑥</sup>关于考古学文化,他认为考古学文化是“表示在考古学遗迹中(尤其是原始社会的遗迹中),所观察到的共同体”<sup>⑦</sup>,他特别强调考古学文化是一个族的共同体<sup>⑧</sup>。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夏鼐的考古学和考古学文化的定义是他所处时代背景和语境的典型产物,在他的定义中,他将考古学定位于“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将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确定为“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将指导考古学研究的理论确定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强调“考古学文化是一个族的共同体”,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在近现代中国的特定时代背景下,他所受到的民族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实证史学的影响。

## 三、中国历史学暨考古学的未来趋势

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国历史学与考古学的未来发展趋势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中国历史学与考古学的未来发展有如下趋势。

### (一) 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史阐释与叙述的兴起

近代以来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世界,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越来越深入人心,历史学的变化也与这个时代趋势相呼应。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开启,早期的全球化是西方文化主导的全球化,表现在历史学中,就是西方文化霸权下的西方文化中心观全球史的建构。在这种历史叙述中,文化循单线进化,西方文化最先进,代表人类的发展方向,其他地区的文化处于这一文化演化道路上的相对落后阶段,只有通过学习西方文化,才能赶上先进文化。

随着西方霸权的衰落和各地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民族国家纷纷出现,民族主义思潮影响全世界。为了争取民族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平等地位与权力,构建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培养民族国家认同感和凝聚力,民族主义思潮主导的民族国家历史叙述在世界各国涌现,其中就包括中国近代以来的新史学运动。民族主义史观和史学表现为强烈的对自我民族悠久历史与文化传统的肯定与推崇和对其他民族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否定与贬低,以及西方文化话语霸权的批判。

进入21世纪,人类进入深度的全球一体化进程,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不同国家之间人员流动的日益频繁,地球村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国外”和“国际”已渐渐让位于“全球”,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全球命运共同体的一员。学者们也越来越多地把国家、区域历史和文化置于全球背景中进行考察,尤其是对不同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

当代方兴未艾的全球史观和全球史书写正是“全球化进程在史学领域的直接反映”<sup>⑥</sup>。巴勒克拉夫说:“今天历史学著作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全球性。”“世界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sup>⑦</sup>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从1990年代起风靡全球的全球史人类历史叙述将取代民族国家历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

全球史思维要求我们超越国家、民族的视野与思维局限,关注人类共同的问题,在人类文化史视域内发现问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提出解释与叙述,对各种古代文化现象作跨区域的考察,在全球视野中研究文化现象的源流演变、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互动及其对整个类发展的影响。

通过新史料、新研究,我们看到,古代中国同世界的联系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早,还要密切。中国文化不仅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是世界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在过去的历史上也一直是人类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在现在与过去,它都不是孤独的存在和完全独立的发展,而是与周边的其他文化共存、互动,包括来自遥远的中亚、西亚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 (二) 超越实证史观,接受多元阐释

史学从精英史学到大众史学,从少数人的特权到大众也可享有的权利,从以少数政治人物为核心到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政治史叙述,再到以所有人为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史叙述,参与者、研究视角、指导思想、评价体系、社会需要等日益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必然导致史学阐释与建构的多元化。

## (三) 中国考古学:由证经补史到考古写史

对于中国考古学来说,其发展趋势将是由过去的证经补史<sup>⑧</sup>的辅助作用到考古写史<sup>⑨</sup>的主导作用。

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及其在中国的引进与发展,带来了不同于传统文献史学的全新的、系统的新史料、新视角、新方法、新思维和新认识。中国考古学通过考古发现的大量古代物质文化遗存和多角度的研究远远超越了传统史学的史料内容和研究视野,正在渐渐改变传统中国古史的叙述内容、叙述方式和观念,如研究关注点从政治史绝对核心向多层次、全方位的人类文化史转变,历史叙述由仅有以文献为基础的传统

王朝体系到同时出现以考古学文化为基础的全方位文化、社会发展史体系;关注重心由精英历史转向大众历史,由以帝王将相和精英文化为核心转向以古人社会、文化为核心;由传统的中原中心论转向多元一体史观;等等。

所有这些史料的扩展、视角和思路的转变以及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专题研究成果为我们建构不同于文献记载古史的考古本位古史叙述提供了可能。可以说,摆脱传统文献史学的影响,中国考古学由传统古史体系中的证经补史从属角色向考古写史的核心角色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并将成为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之一。

## 注 释:

① [意]克罗齐著,田时纲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6页。

② [加]布鲁斯·崔格尔著,徐坚译:《考古学思想史》中文版序,岳麓书社,2008年,第2、3页。

③ 陈淳:《考古学史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发展史——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读后感》,《南方文物》2009年第1期。

④ [美]伊恩·霍德、[美]司格特·哈特森著,徐坚译:《阅读过去》,岳麓书社,2005年,第12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

⑥ 于沛:《关于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⑦ 1955年,美国学者J.H.斯图尔德最早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指出它主要是“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异规律的一种学说。”“文化生态学是就一个社会适应其环境的过程进行研究。它的主要问题是确定这些适应是否引起内部的社会变迁或进化变革。”强调人类文化创造与自然、人文环境的适应关系。见[美]朱利安·H·斯图尔特著,潘艳、陈洪波译:《文化生态学》,《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环境史(对生态的关注,将生态作为一种社会发展变化的动力)试图构建一种自然史与社会发展史相关联的新的历史叙述模式。环境史的叙述对象是在时间流变中存在着的人与自然关系。环境史的叙述带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并含有重估人类行为的重大寓意。其目的之一,是为了促使人们更好地关心被叙述的对象。虽然传统历史学也涉及环境的变迁、人与环境的互动等相关问题研究,但对环境问题如此重视则是近年的事。环境史的出现反映了当代严峻的环境危机问题和人们的强烈的环境意识。见田丰、李旭明主编:《环境史: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叙述历史》,王利华序,商务印书馆,2011年。

⑧ 即相对于以往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时间、空间尺度下研究历史,“全球史”是在“全球”的时间、空间尺度下

考察和研究历史。

⑨ 朱本源:《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4页。

⑩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第164、165页。

⑪ 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和德国的莱因哈德·考泽莱克开创了概念史研究。概念史研究,通过研究概念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移动、接受、转移和扩散,来讨论影响和形成概念的要素是什么、概念的含义和这一含义的变化,揭示概念如何成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核心,以及新的概念如何取代旧的概念。“概念史”关于“概念”的第一项研究预设是强调“概念”的历史性、偶在性和易变性。在概念史研究中,不再进行词源学研究,考察某个词汇的演变,而是更多地将语义学作为重要工具,研究一个特定概念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里的不同含义。见张君荣、李宏图、周保巍:《概念史:观照现实的思想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3日A04版。

⑫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

⑬ 徐良高:《当代民族国家史的建构与“最早的中国”之说》,《南方文物》2016年第4期。

⑭ 徐良高:《文化理论视野下的考古学文化及其阐释(下)》,《南方文物》2019年第3期。

⑮ 徐良高:《尊“性”大“名”——以“尊”为例看考古遗物的命名与定性研究》,《南方文物》2015年第1期。

⑯ [美]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⑰ 傅斯年:《论所谓五等爵》,《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册,1930年。

⑱ 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第155页。

⑲ 许倬云:《许倬云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5页。

⑳ 王学典主编:《史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3页。

㉑ 钱茂伟、王东著:《民族精神的华章——史学与传统文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90页。

㉒ 崔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附录·钱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㉓ 徐良高:《商周灭亡原因辨析》,考古研究所编:《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㉔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4《经籍会通》,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40页。

㉕ 干春松:《中国近代思维方式转换的五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11日第6版。

㉖ 王健:《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页。

㉗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㉘ 钱茂伟、王东著:《民族精神的华章——史学与传统文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21、139、140页。

㉙ 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98年,第241~247页。

㉚ 余英时:《关于中国历史特质的一些看法》,《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381页。

㉛ 戴逸:《20世纪中国历史学》,《光明日报》1998年1月20日。

㉜ 李晓英:《21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纪要》,《史学月刊》2001年第4期。

㉝ 侯云灏:《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研究及相关问题》,《史林》2002年第1期。

㉞ 王光:《民族国家叙事下的现当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5月3日第8版。

㉟ 关山、[德]施耐德、李貌华:《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66~67页。

㊱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98年,第110~112页。

㊲ 顾颉刚、谭其骧主编:《禹贡》第1卷第1期,中华书局,2010年。

㊳ 张光直:《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历史月刊》1988年第9期。

㊴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13页。

㊵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第190页。

㊶ 李零:《帝系、族姓的历史还原——读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史》2017年第3辑。

㊷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性成果报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第1页。

㊸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第543页。

㊹ 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6年,第3页。

㊺ 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

㊻ 夏鼐:《再论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夏鼐文集》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59~366页。

㊼ 吴晓群:《我们真的需要“全球史观”吗?》,《学术研究》2000年第1期。

㊽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42页。

㊾ “证经补史”,即以传统文献记载为构建历史叙述的基本史料和主体框架,考古发现与研究围绕历史文献记载的古史体系展开。通过考古发现与研究,证明文献记载之真伪,补充文献记载之不足。

㊿ “考古写史”,即以考古发现与考古学文化为构建古史叙述的基本史料和主体框架,传统文献记载围绕考古学的古史建构体系,用于解读考古发现,补充考古学之不足。

(责任编辑:谢 绮)